

马 书 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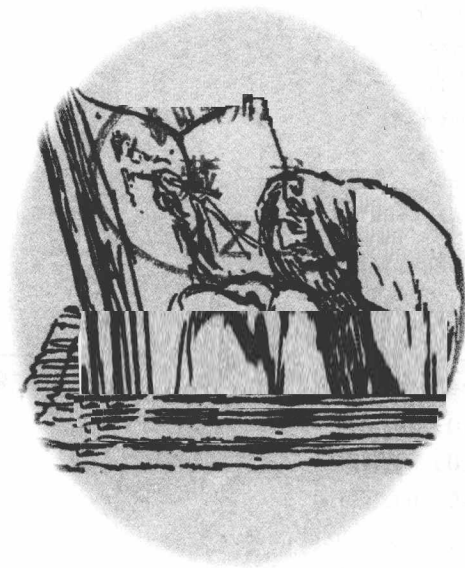
莫言 等/著
郭凤岭/编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房事记

莫言 等/著
郭凤岭/编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写书记/莫言等著;郭凤岭编. —北京:金城出版社, 2011. 12

ISBN 978-7-5155-0266-3

I. ①写… II. ①莫…②郭… III. ①散文集—中国—现代②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15642号

Copyright©2011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 **金城出版社** 所有, 未经许可,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写书记

作 者	莫言 等
编 者	郭凤岭
责任编辑	雷燕青
开 本	635毫米×965毫米 1/16
印 张	16
字 数	190千字
版 次	2012年3月第1版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蓝迪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0266-3
定 价	29.8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 100013
发行部	(010) 84254364
编辑部	(010) 84250838
总编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Contents 目录

- 001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文 / 鲁迅
- 005 《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 文 / 茅盾
- 014 梁宗岱与《晚祷》 文 / 张建智
- 021 谈《家》 文 / 巴金
- 027 关于《沙家浜》 文 / 汪曾祺
- 032 破解《红岩》创作之谜 文 / 钱振文
- 039 《论美》之失 文 / 高尔泰
- 045 芦花吹白上人头，镜里萧疏不奈秋
——《刘氏女》笔谈 文 / 章诒和 曹疏影
- 054 为自己写，给朋友读
——写在《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出版之际 文 / 周国平
- 059 宿命的写作 文 / 史铁生
- 070 我为什么要写作 文 / 王小波
- 074 艰难的开端 文 / 残雪
- 080 记忆与写作 文 / 马原

- 095 十年回首：《草房子》创作札记 文 / 曹文轩
- 106 我为什么写作 文 / 莫言
- 137 为了一个野心
——《农民三部曲》写作始末 文 / 赵德发
- 149 迎着北风赶路
——张炜与《你在高原》 文 / 张炜 孙竟
- 159 我为何写作 文 / 余华
- 162 筒子楼里的戏剧人生
——《混在北京》的写作记忆 文 / 黑马
- 171 还愿到上海
——我写《上海王》 文 / 虹影
- 174 写书难，出书更难 文 / 陈希我
- 178 我如何写出《雨天的棉花糖》 文 / 毕飞宇
- 183 《1980 的情人》创作谈 文 / 于晓丹
- 190 乘着语言的翅膀
——我写儿童诗集《做梦的树》 文 / 雨兰

196	因为无力，所以执著 ——我为什么要写作？ 文 / 熊培云
213	用生命写作 文 / 黄孝阳
219	通往虚名之路 ——《中国文学场》写作有感 文 / 曾念长
223	小说未完成 文 / 未名
230	编后记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¹

文/鲁迅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现代著名文学家。代表作有小说集《呐喊》《彷徨》，散文集《朝花夕拾》，散文诗集《野草》，论著《中国小说史略》，杂文集《南腔北调集》《且介亭杂文集》等，有《鲁迅全集》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来由，已经在《呐喊》的序文上，约略说过了。这里还应该补叙一点的，是当我留心文学的时候，情形和现在很不同：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并没有人想在这一条道路上出世。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

但也不是自己想创作，注重的倒是在介绍，在翻译，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为那时正盛行着排满论，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的。所以“小说作法”之类，我一部都没有看过，看短篇小说却不少，小半是自己也爱看，大半则因了搜寻介绍的材料。也看文学史和批评，这是因为想知道作者的为人和思想，以便决定应否介绍给中国。和学问之类，是绝不相干的。

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也曾热心的搜求印度、埃及的作品，但是得不到。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

1. 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三年六月上海天马书店出版的《创作的体验》一书。

的果戈理(N. Gogol)和波兰的显克微支(H. Sienkiewicz)¹。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鸥外²。

回国以后,就办学校,再没有看小说的工夫了,这样的有五六年。为什么又开手了呢?——这也已经写在《呐喊》的序文里,不必说了。但我的来做小说,也并非自以为有做小说的才能,只因为那时是住在北京的会馆³里的,要做论文罢,没有参考书,要翻译罢,没有底本,就只好做一点小说模样的东西塞责,这就是《狂人日记》。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

但是《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⁴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自然,做起小说来,总不免自己有些主见的。例如,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做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所以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

1. 显克微支(1846—1916),波兰作家。作品主要反映波兰农民的痛苦生活和波兰人民反对异族侵略的斗争。著有历史小说三部曲《火与剑》《洪流》《伏洛塞耶夫斯基先生》和中篇小说《炭画》等。

2. 夏目漱石(1867—1916),日本小说家,著有长篇小说《我是猫》、中篇小说《哥儿》等。森鸥外(1862—1922),日本小说家、文学评论家,著有小说《舞姬》等。

3. 会馆指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一九一二年五月至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作者曾在此寄住。

4. 陈独秀(1880—1942),字仲甫,安徽怀宁人,原为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人,“五四”时期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五四”时期,他在致周作人的函件中,极力敦促鲁迅从事小说写作,如一九二〇年三月十一日信:“我们很盼望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请先生告诉他。”又八月二十二日信:“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

这方法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

我做完之后，总要看两遍，自己觉得拗口的，就增删几个字，一定要它读得顺口；没有相宜的白话，宁可引古语，希望总有人会懂，只有自己懂得或连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来的字句，是不大用的。这一节，许多批评家之中，只有一个人看出来，但他称我为 Stylist¹。

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有人说，我的那一篇是骂谁，某一篇又是骂谁，那是完全胡说的。

不过这样的写法，有一种困难，就是令人难以放下笔。一气写下去，这人物就逐渐活动起来，尽了他的任务。但倘有什么分心的事情来一打岔，放下许久之后再写，性格也许就变了样，情景也会和先前所豫想的不同起来。例如我做的《不周山》，原意是在描写性的发动和创造，以至衰亡的，而中途去看报章，见了一位道学的批评家攻击情诗²的文章，心里很不以为然，于是小说里就有一个小人物跑到女娲的两腿之间来，不但不必有，且将结构的宏大毁坏了。但这些处所，除了自己，大概没有人会觉到的，我们的批评大家成仿吾先生，还说这一篇做得最出色。

我想，如果专用一个人做骨干，就可以没有这弊病的，但自己没有试验过。

忘记是谁说的了，总之是，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

1. Stylist, 英语：文体家。作者这里所指似为黎锦明。黎在《论体裁描写与中国新文艺》（见《文学周报》第五卷第二期，一九二八年二月合订本）一文中说：“西欧的作家对于体裁，是其第一安到著作的路的门径，还竟有所谓体裁家（Stylist）者。……我们的新文艺，除开鲁迅、叶绍钧二三人的作品还可见到有体裁的修养外，其余大都似乎随意的把它挂在笔头上。”

2. 一位道学的批评家指胡梦华。他在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四日《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读了〈蕙的风〉以后》，攻击汪静之作的诗集《蕙的风》，认为其中某些情诗是“堕落轻薄”的作品，有“不道德的嫌疑”。参看《热风·反对“含泪”的批评家》。

画他的眼睛。¹ 我以为这话是极对的，倘若画了全副的头发，即使细得逼真，也毫无意思。我常在学学这一种方法，可惜学不好。

可省的处所，我决不硬添，做不出的时候，我也决不硬做，但这是因为我当时别处有收入，不靠卖文为活的缘故，不能作为通例的。

还有一层，是我每当写作，一律抹杀各种的批评。因为那时中国的创作界固然幼稚，批评界更幼稚，不是举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倘将这些放在眼里，就要自命不凡，或觉得非自杀不足以谢天下的。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

但我常看外国的批评文章，因为他于我没有恩怨嫉恨，虽然所评的是别人的作品，却很有可以借镜之处。但自然，我也同时一定留心这批评家的派别。

以上，是十年前的事了，此后并无所作，也没有长进，编辑先生要我做一点这类的文章，怎么能呢。拉杂写来，不过如此而已。

三月五日灯下。

1. 这是东晋画家顾恺之的话，见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巧艺》：“顾长康（按即顾恺之）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睛。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阿堵，当时俗语：这个。

《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

文/茅盾

茅盾（1896—1981），原名沈德鸿，字雁冰，浙江嘉兴桐乡人，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子夜》《幻灭》《虹》，短篇小说《林家铺子》等，有《茅盾全集》4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三〇年秋，我眼疾、胃病、神经衰弱并作，医生嘱我少用眼多休息。闲来无事，我就常到卢表叔公馆去，跟一些同乡故旧晤谈。他们是卢公馆的常客，他们中有开工厂的，有银行家，有公务员，有商人，也有正在交易所中投机的。从他们那里我听到了很多，对于当时的社会现象也看得更清楚了。那时，正是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在津浦线上大战，而世界经济危机又波及到上海的时候。中国的民族工业在外资的压迫和农村动乱、经济破产的影响下，正面临绝境。为了转嫁本身的危机，资本家加紧了对工人的剥削。而工人阶级的斗争也正方兴未艾。翻开报纸，满版是经济不振、市场萧条、工厂倒闭、工人罢工的消息。我又时常从朋友那里得知南方各省的苏维埃红色政权正蓬勃发展，红军粉碎了蒋介石多次的军事围剿，声威日增。尤其彭德怀部红军的攻占长沙，极大地振奋了人心。这些消息虽只片段，但使我鼓舞。当时我就有积累这些材料，加以消化，写一部白色的都市和赤色的农村的交响曲的小说的想法。

一九三〇年夏秋间进行得很热闹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对于确定我这部小说的写作意图，也颇有关系。当时的论战者提出了三种论点：一、中国社会依旧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推翻代表帝国

主义、封建势力、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蒋介石政权，是当前革命的任务，领导这一革命的是无产阶级。这是革命派的观点。二、中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应由中国资产阶级来担承。这是托派的观点。三、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可以在既反对共产党，又反对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阶级的夹缝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建立欧美式的资产阶级政权。这是一些资产阶级学者的观点。我写这部小说，就是想用形象的表现来回答托派和资产阶级学者：中国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买办阶级的压迫下，是更加半封建半殖民地化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中虽有些如法国资产阶级性格的人，但是一九三〇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不同于十八世纪的法国，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前途是非常暗淡的。它们软弱而且动摇。当时，它们的出路只有两条：投降帝国主义，走向买办化，或者与封建势力妥协。

我最初设想，这部都市—农村交响曲将分为都市部分和农村部分，都市部分打算写三部曲，并且写出了初步的提纲。

我本来打算以《棉纱》《证券》《标金》三部曲作为新小说的都市部分，而贯穿于此中的一个人就是《棉纱》中厂主之老弟。但是写完了提纲，就觉得这种形式不理想：农村部分是否也要写三部曲？这都市三部曲与农村三部曲又怎样配合、呼应？等等，都不好处理。于是我就搁下了这个计划。

十一月，我转而写中篇小说《路》，这就又回到了写知识分子的题材。可是才写了一半多，眼病又第二次发作，这次比上次更严重。上次目疾发作时为我治病的某眼科医生，此次却束手无策。这就为难了。上海的眼科医生也不少，为我治病的那位，算是其中翘楚。他也束手无策，那么，还有谁可以请教。幸而郑振铎介绍了他的同乡而新从日本回来在上海开业的刘以祥。他检查我的两眼，就说我是老痧眼，现在两眼

上眼皮已无痧粒，却结成癍，这不是此次眼疾之原因。此次眼疾之所以严重，在于右眼角膜溃烂，成一小孔，左目则有厚翳从上而下已掩半个瞳孔。我听这么说，有点发慌。我问刘以祥怎么办呢？他说右目易治，只要注射自己血清，大约一星期可以复原，左目那层翳却比较难以对付，说不定多少时间可以消除。所谓自己血清者，是从我身上抽一点血，然后配以药。注射部分是在右目眼角。我听说要在眼上打针，即使是在眼角，也觉得诧异。但事到如今，只有照办。当天，刘医生取了我的血，嘱我第二天去注射。我回家对母亲和德沚说了，她们都大骇，说从没听说眼上可以打针。因此，第二天我去时，德沚便也同去。注射前，刘以祥叫我心想别事，不把注射当一回事。我闭目如教，心想写作之事，一会儿，刘以祥说成了，我睁开眼，不知何时已经注射完毕。刘以祥又问我喝酒否，抽烟否？我答以向不喝酒，但抽烟却多。刘说，从今以后，也不能抽烟了。又取出一支药膏，说每天几次抹在眼上，抹后要轻轻揉几下，并给了小小的玻璃管，说药膏就涂在管上。这种药膏是什么名字，我忘记了，但记得药厂名为 Lily。回家后，德沚说，注射是右目左角眼皮上，也称赞医生本领好，这眼皮上注射真不容易。因为刘医生叫我不能再看书写字，总之不能再用眼，所以母亲就叫德沚监督我。

我每星期到刘医生处复诊。两星期后，右眼已经恢复原状，但左目的云翳如故。我耐心养病，左目不看书看报。如是者三个月，刘以祥说我的左目上的云翳也退去了。他说，出乎他的意料，我竟恢复得这样快。我说，这是因为严格遵守你的教导之故。药膏没有用完，刘以祥说可以继续用，每晚临睡前一次，直到用完为止。我也如教。

在这三个月的休息期间，眼虽不能多用，我的思想却大活动。我暂时抛开了《路》，又回到城市—农村三部曲上来了。我决定改变计划，不写三部曲而写以城市为中心的长篇，即后来的《子夜》。旧计划《标金》的故事第一节古先生的半肢疯及受不了都市的混乱紧张生活的刺

激而中风，保留下来，但不是火柴厂老板的父亲而变为吴荪甫的父亲了。火柴厂之亏本等等也保留，但厂主是周仲伟了，而且这个火柴厂主的性格比原计划的要复杂得多。

其次，我进一步研究当时的中国经济现状，决定将纱厂改为丝厂。因为，当时中国的工业产品以外销为主要业务的，唯有厂丝（即机器缫成的丝），而且在法国里昂、美国纽约市场早已站稳脚跟，但此时受日本丝之竞争而渐趋于失利之地位。

这三个月中，好像重温读过的书，我又访问了从前在卢公馆所遇到，并曾和他们长谈过的同乡亲戚故旧。正所谓温故而知新，这一次重访同乡故旧，在他们的谈话中，使我知道仅一九三〇年，上海的丝厂由原来的一百家变成七十家。无锡丝厂由原来的七十家变成四十家。广东丝厂的困难也差不多。其他苏州、镇江、杭州、嘉兴、湖州各丝厂十之八九倒闭。四川丝厂宣告停业的，二三十家。这都是日本丝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的结果。这坚定了我的以丝厂作为《子夜》中的主要工厂的信心。我又从同乡故旧的口中知道，一九二九年中国火柴厂宣告破产的，江苏上海九家，浙江三家，河北三家，山西四家，吉林三家，辽宁三家，广州十三家。这又坚定了我以内销为主的火柴厂作为中国民族工业受日本和瑞典的同行的竞争而在国内不能立足的原定计划。这便是我用力描写周仲伟及其工厂之最后悲剧的原因。

同时我再一次参观了丝厂和火柴厂。我是第一次写企业家，该把这些企业家写成怎样的性格，是颇费踌躇的。小说中人物描写的经验，我算是有了一点。这就是把最熟悉的真人们的性格经过综合、分析，而后求得最近似的典型性格。这个原则，自然也可适用于创造企业家的典型性格。吴荪甫的性格就是这样创造的；吴的果断，有魄力，有时十分冷静，有时暴跳如雷，对手下人的要求十分严格，部分取之于我对卢表叔的观察，部分取之于别的同乡之从事于工业者。周仲伟的性格在书中算是另一种典型，我同样是综合数人而创造的。

在决定改写长篇小说之后，我就重新构思写出了《提要》和一个简单的提纲，在我的眼疾完全治愈，并续写完了《路》之后，又据此提纲写出了约有若干册的详细分章大纲。现在这些大纲都丢失了，但那个《提要》却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

总之，《子夜》的初步计划，还是雄心勃勃的，虽然不再是城市—农村交响曲，却仍旧想使一九三〇年动荡的中国得—全面的表现。

但是，当我提要要根据分章大纲写成小说时，就感到规模还是太大，非有一二年时间的详细调查，有些描写便无从下手。而我却无法储备一—二年的生活费以便从事详细的调查。而且关于军事行动的描写，即使作了调查也未必能写好，因为我没有在部队中工作（即使是政治工作）的经验。于是就有再次缩小计划的考虑，彻底收起那勃勃雄心。

不过，我真正下定决心缩小计划，还是在写完了前几章的初稿之后。那时接连发生了几件事，又打乱了我的写作时间表。

一九三一年四月下旬，泽民和琴秋要去鄂豫皖苏区了，他们来告别，谈到秋白在四中全会后心情不好，肺病又犯了，现在没有工作；并告诉了我秋白的新住址。于是第二天我和德沚去看望他们。秋白和之华见了我们很高兴，因为我们有四五个月没有见面了。在叙了家常之后，秋白问我在写什么，我答已写完《路》，现在在写长篇小说，已草成四章，并把前数章的情节告诉他。他听了很感兴趣，又问全书的情节。我说，那就话长了，过几天等我把已写成的几章的原稿带来再详谈罢。过了两天，记得是一个星期日，我带了原稿和各章大纲和德沚又去，时在午后一时。秋白边看原稿，边说他对这几章及整个大纲的意见，直到六时。我们谈的最多的是写农民暴动的一章，也谈到后来的工人罢工。写农民暴动的一章没有提到土地革命，写工人罢工，就大纲看，第三次罢工由赵伯韬挑动起来也不合理，把工人阶级的觉悟

降低了。秋白详细地向我介绍了当时红军及各苏区的发展情形，并解释党的政策，何者是成功的，何者是失败的，建议我据以修改农民暴动的一章，并据以写后来的有关农村及工人罢工的章节。正谈得热闹，饭摆上来了，打算吃过晚饭再谈。不料晚饭刚吃完，秋白就接到通知：娘家有事，速去。这是党的机关被破坏，秋白夫妇必须马上转移的暗号。可是匆促间，他们往何处转移呢？我们就带了他俩到我家中去。当时我家在愚园路树德里，住的是三楼厢房。二房东是个商人。我曾对二房东说，我是教书的。现在带了秋白夫妇来，我对二房东说是我的亲戚，来上海治病，不久就要回去。我让孩子睡在地板上，把床让给秋白夫妇睡。之华大概觉得我们太挤了，住了一夜，第二天就转移到别处去了。秋白在我家住了一两个星期。那时天天谈《子夜》。秋白建议我改变吴荪甫、赵伯韬两大集团最后握手言和的结尾，改为一胜一败。这样更能强烈地突出工业资本家斗不过金融买办资本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没有出路的。秋白看原稿极细心。我的原稿上写吴荪甫坐的轿车是福特牌，因为那时上海通行福特。秋白认为像吴荪甫那样的大资本家应当坐更高级的轿车，他建议改为雪铁龙。又说大资本家愤怒绝顶而又绝望就要破坏什么乃至兽性发作。以上各点，我都照改了。但是，关于农民暴动和红军活动，我没有按照他的意见继续写下去，因为我发觉，仅仅根据这方面的一些耳食的材料，是写不好的，而当时我又不可能实地去体验这些生活，与其写成概念化的东西，不如割爱。于是我就把原定的计划再次缩小，又重新改写了分章大纲，这一次是只写都市而不再正面写农村了。但已写好的第四章不忍割舍，还是保留了下来，以至成为全书中的游离部分。这个新的分章大纲比前一个分章大纲简单多了，现在还保存着其中的一部分。

经过与秋白的交谈，我就考虑如何压缩《子夜》的原定计划。可是尚未动笔，雪峰又来找到我，一定要我担任下半年的“左联”行政书记。

不久，秋白也参加了“左联”的领导工作，他向我提出要总结“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的经验，要我写两篇论文。加之那年的夏天奇热，一个多月的期间天天老是华氏九十几度的天气，我的住房又在三楼，热得喘不过气来。这样，我只好满足于先把新的分章大纲写出来，而把《子夜》的写作暂时搁下，专注于“左联”的日常工作。直到十月份，我觉得写《子夜》的计划不能再拖了，便向冯雪峰辞去“左联”行政书记之职，坐下来，按照新的分章大纲，重新往下写。我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写的后记中说的：“《子夜》十九章，始作于一九三一年十月，至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五日脱稿；期间因病，因事，因上海战争，因天热，作而复辍者，综记亦有八个月之多，所以也还是仓猝成书，未惶细细推敲。”就是指的这次重新提笔以后的情形。

关于《子夜》的题名也有一个变化，最初的题名我曾拟了三个：夕阳、燎原、野火，后来决定用《夕阳》，署名为逃墨馆主。当时是应《小说月报》主编郑振铎之请，打算从一九三二年起先在《小说月报》连续刊登（其实，那时全书尚未写完，只写了一半）。不料突然发生“一·二八”上海战事，商务印书馆总厂为日本侵略炮火所毁，《小说月报》从此停刊，我交去的那部分稿子也被毁了。幸而还有我亲手写的原稿，交去的是德沚抄的副本。何以不用原来的笔名（茅盾）而用逃墨馆主呢？这无非一时的好奇，让人家猜猜：自有新文学运动以来，从没有写过的企业家和交易所等，现在有人写了，这人是谁呢？孟子说过，天下之人，不归于阳，则归于墨。阳即阳朱，先秦诸子的一派，主张“为我”，阳朱的书早已亡佚，仅见《列子》的《阳朱篇》保存“为我学说”的大概。我用“逃墨馆主”不是说要信仰阳朱的为我学说，而是用了阳字下的朱字，朱者赤也，表示我是倾向于赤化的。《夕阳》取自前人诗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比喻蒋政权当时虽然战胜了汪、冯、阎和桂、张，表面上是全盛时代，但实际上已在走下坡路，是“近黄昏”了。

《小说月报》既停刊，连载的计划自然打消，我乃决定写完全书后